

后危机时代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障碍分析与路径选择

富景筠*

摘要：在 2012 年 5 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同意年内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领导人取得这一共识，无疑对东北亚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滞后状态具有关键意义。然而，近期东北亚地缘政治冲突风险的不断升级使得中日韩自贸区年内启动的前景变得不明朗。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通过制度性合作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地区性最终消费市场规模，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长期趋势。就目前而言，率先启动中韩自贸区、以此推动中日韩自贸区是相对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中日韩自贸区 地缘政治 经济结构转型 中韩自贸区

自 1999 年中日韩自贸区构想形成后，中日韩三国对自贸区可行性进行了近十年的民间及官产学联合研究。2012 年 5 月，在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同意年内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领导人取得这一共识，无疑对东北亚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滞后状态具有关键意义。然而，当中日韩自贸区的发展进程实现突破后不久，中越和中菲在南海摩擦持续升温，中日钓鱼岛、日韩独岛主权争端加剧。东北亚地缘政治冲突风险的不断升级，使得中日韩自贸区年内启动的前景变得不明朗。

与此同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日韩提出了深化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需要。中日韩三国通过制度性合作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地区性最终消费市场规模，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长期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目前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演变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但从市场驱动向制度驱动演进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仍将是该地区的主旋律。以下，我们将首先分析后危机时代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及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诸多障碍，继而从中日韩三国自贸区战略的角度考察中日韩自贸区的路径选择。

一 自贸区作为应对后危机时代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式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博士。作者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的审读，当然，文责自负。

中日韩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全球贸易大国。随着中日韩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三国相互间已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在对日本、韩国的贸易中均保持逆差地位，而且逆差规模持续扩大。2011年，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韩国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六位。同年，日本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商品贸易领域，中日韩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跃升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①中日韩三国的服务贸易也实现迅速发展。2000~2009年间，中日服务贸易从65.27亿增至247亿美元；中韩服务贸易从42.55亿增至157亿美元；韩日服务贸易从128.43亿增至160.75亿美元。中日、中韩、韩日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94%，15.61%和2.5%。^②

促使中日韩贸易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三国间的经济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而这种互补性又是由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决定的。日本和韩国资金充裕、技术先进，但能源和工业资源短缺，劳动力相对短缺。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低廉，但资金缺乏。中日韩三国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表现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因此，不同层次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产业结构的依次传递转移。

具体而言，中国产业结构层次最低，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制造业和金融、物流、医药卫生等服务产业方面处于弱势。最具竞争力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品或农产品，产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日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信息工程、生物技术、节能环保、医药和多媒体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汽车、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③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韩国产业结构层次处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其在无线通讯器材和造船业、汽车及汽车配件等领域具有一定竞争优势。

在以产业转移与承接为内容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日本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同时也是高新技术的主要来源。韩国既是日本资本和高新技术的“吸收器”，又充当了向中国提供部分资金、中等技术和部分中间品供应者的角色。中国则在吸收日韩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向它们提供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潜在市场、日本的尖端技术和充足资本、韩国在生产技术和经济开发方面的经验等因素的结合，促进了东北亚地区分工模式的形成。这使得各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生产要素配置的联合生产体系并

^① 中国外交部：《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2012。

^② 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

^③ 张建平：《构建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试验区政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132页。

达到国际分工的最大效益。^①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与转型,为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遇阻的形势下,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对区内国家促进发展和提升抵御危机的作用日渐增强。美国是中日韩三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下,美国大力发展制造业、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美国市场需求的萎缩使得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中日韩面临出口锐减的困境。具体来看,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调低了经济增长速度。日本经济在国内外需求减弱的双重影响下出现负增长。而出口减弱、资金外逃也对出口依赖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韩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下滑影响。^②

由此可见,中日韩三国建立自贸区是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选择。自贸区不但能够给三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在金融危机时能够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复苏。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后,三国间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区域内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同时,随着区内市场的扩大及来自内外部竞争的加剧,中日韩三国建立自贸区将推动各自国内经济体制、产业组织、企业制度等方面的结构调整。从产业间分工来看,日本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制造业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韩国则将介于二者之间,即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领域均有所提升。从产业内分工来看,在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和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内,三国将在产业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和差异化产品间开展分工合作。作为超国家层次的制度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可节约三国间经济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减少贸易摩擦,有效配置区域内的经济资源,最终使中日韩区域经济中的贸易、投资及产业合作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③

二 对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障碍分析

关于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障碍分析,国内学界的一个重要视角是从政治因素切入问题。主要观点是中日韩三国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中日钓鱼岛、日韩独岛等领土争端以及日韩海洋权益的分歧,使得三国间严重缺乏政治互信,这成为制约中日韩自贸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作为一种制度构建的区域合作,其层次与水平的基础是由资本、货物、服务和

^① 陈本昌、周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思考》,《理论界》2006年第10期,第193页。

^② 张良贵、牟晓云:《美国金融危机对中日韩三国经济影响的经验分析》,《东疆学刊》2012年第2期,第109页。

^③ 王丽娜:《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为核心和先导的东北亚合作模式》,《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55~356页。

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区内国家间自发流动而形成的区域性生产和交换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讲,除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视角外,我们还需从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关联本身分析影响三国合作从市场驱动向制度驱动演进的相关因素。

首先,从各国对区域内贸易的依赖程度看,尽管东北亚国家对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但与欧盟和北美相比仍非常有限。具体来看,1998~2000年间,中国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平均为27%。2003年以后,这一比重急剧下降,到了2009年仅为19%。在区内大国中,日本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上升得最快,从1998年的13%增加到2009年的28%。韩国则是区内大国中对区域内贸易依赖性最强的国家。自2003年,该国区域内贸易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①显然,与欧盟和北美的区域内贸易比重相比^②,中日韩三国对区域内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待提升。

其次,中日韩三国的垂直型产业分工格局使得它们在一些产业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而这些产业构成各自在自贸区谈判中的敏感领域。具体来看,钢铁、家电、汽车、造船等不仅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同时也是日韩的优势产业。中日韩在产业链条的位置不同,日韩占据产业高端,中国则相对处在低端。在制造业方面,化工产品、自控机床等制造业产品是中国需要保护的敏感产品,而它们又恰好是日韩的优势产品。

再次,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成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瓶颈。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占其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较大。日本和韩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就三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言,一方面,中国出口日韩的农产品受到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如高额关税、关税配额及严格的检验检疫、各种标准等非关税壁垒的运用,这导致贸易摩擦频发。另一方面,日韩对国内农产品实施更加完备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支持政策,这使得日韩农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无法得以有效提升,进而导致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愈加困难。^③日本、韩国农业团体对农业保护的游说活动,使得两国政府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难以做出妥协,特别是日本的农林水产问题已成为其参与自贸区谈判的重要制约。

最后,服务贸易也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的敏感领域。虽然中日韩的服务贸易总额近年来增长较快且位居世界前列,但三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弱,而且各部门的发展很不均衡。中国在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以劳务输出为主)这两个部门对日韩有比较优势,而在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部门具有显著的比较劣势。日本在建筑、专有权利

^① UN COMTRADE Database.

^② 2008年,欧盟区域内贸易比重高达72.8%,北美区域内贸易比重在50%左右。(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 2009.)

^③ 曾文革、陈晓芳:《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分析》,《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1期,第13页。

使用费和特许费、运输等部门具有比较优势，但在旅游、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文化和休闲服务等多个部门的竞争力较弱。韩国在运输、政府服务这两个部门的比较优势最为明显，而其旅游、建筑、其他商业服务等部门的竞争力较弱。^①考虑到中日韩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敏感部门较多的现实情况，在未来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三国都将对服务业的开放持谨慎态度。

三 从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区战略分析中日韩自贸区的路径选择

东北亚地区目前还没有任何双边或多边自贸区协定，这与其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地位极不相称。中日韩自贸区的建成不仅将为三国的贸易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而且也是东北亚、东亚经济实现一体化的关键环节。显然，中日韩自贸区的构建过程既充满希望，又困难重重。就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区战略而言，三国近年来都推行积极的自贸区战略并将东亚国家作为自贸区谈判的主要对象国，但它们自贸区战略实施的重点和路径存在很大差异。这促使我们从三国自贸区战略的角度分析中日韩自贸区的现实路径选择。

中国自贸区战略的目标收益包括经济、政治及安全因素，同时通过寻求稳定、多元的战略资源供应渠道和稳定的国际市场，满足国内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后，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比较有利的地位。中国目前的自贸区战略主要是加快东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特别是与日本和韩国组建自贸区。

具体来看，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体现了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中国是地区性大国，同时也是发展中大国。由于与欧美开启自贸区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中国把建立自贸区的合作伙伴主要定位在东亚地区。同时，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及避免对外贸易摩擦，中国有选择地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自贸区谈判。其次，在实行灵活的自贸区战略的同时，中国采取循序渐进、不断推进直至达成全面协议的方式。具体包括先签订早期收获计划，减免部分商品关税，而后逐渐纳入投资、服务和贸易便利化等内容。最后，其自贸区协议往往不涉及短期内难以协调和处理的敏感行业或问题，而是将其作为例外条款留待以后解决，如知识产权保护、特殊行业的自由化、环境和劳工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等。^②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范围内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日本的贸易政策发生了重大改

^① 刘晨阳：《中日韩 FTA 服务贸易谈判前景初探：基于三国竞争力的比较》，《国际贸易》2011 年第 3 期，第 51 页。

^② 盛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3 期，第 63~65 页。

变,从坚持传统的多边贸易体系转向重视地区和双边主义。在近十年的自贸区谈判中,日本也一改最初的“防御性”^①特点,显示出积极主动的趋势。日本推行积极自贸区政策的具体原因有四个。第一,由于在WTO框架下实现贸易自由化困难重重,日本对多边协调机制的期待逐渐降低。^②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使得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严峻挑战,这促使日本借助双边主义来保护产业界在海外市场的商业利益。^③第三,出于推动国内结构改革的需要,即通过推进自贸区来解决受保护部门的低效率问题,从而提升日本经济的整体竞争力。^④第四,通过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外国家拉入东亚合作框架来平衡并牵制中国的力量,由此寻求掌握东亚合作的主导权。^⑤

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公布了《日本的自贸区战略》。该战略提出了日本建立自贸区的基本原则和构想,并强调在多边贸易的基础上把外交战略的核心转向双边贸易自由化。^⑥此后不久,经济产业省也出台了《日本加强经济伙伴的政策》,并提出“经济伙伴协议”(EPA)概念。就外延而言,这一概念比自贸区更加宽泛,它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还涵盖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竞争规则和标准认证等。^⑦在日本看来,追求内容广泛的经济伙伴协议战略更符合自身利益。

在日本的自贸区战略中,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考虑要优先于经济利益,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战略利益。一是维护日本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影响。二是提升日本作为东西方的纽带作用,发挥其作为亚洲地区唯一发达国家的独特优势,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⑧在自贸区谈判的优先顺序上,日本提出其双边自贸区要具备综合性、灵活性和有选择性的特点。^⑨

主张积极自贸区战略的韩国将自贸区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与重要国家或地区签署自贸区协议。作为一个资源贫乏、主要依靠技术推动和出口导向的经济体,韩国期待通过自由贸易弥补国内市场狭小和资源匮乏的缺陷。韩国看重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市场和资

^① Jose Guerra Vio, “Japan’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ategy: A Nascent and Competitive FTA Diplomacy”,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2010, Vol. 3, No. 2, p. 27.

^② 张祖国:《日本积极推进FTA战略的若干问题》,《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第80~81页。

^③ 于潇:《从日本FTA战略看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现代日本经济》2007年第5期,第16页。

^④ 李俊久:《日本FTA战略论析》,《当代亚太》2009年第2期,第115~116页。

^⑤ 赵放:《日本FTA战略的困惑》,《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51页。

^⑥ 日本外务省网站, <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fta/strategy0210.html>。

^⑦ 经济产业省网站, http://www.meti.go.jp/english/policy/index_externaleconomicpolicy.html。

^⑧ 杨义瑞:《日本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立场浅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第72页。

^⑨ 综合性是指自贸区不仅涉及消除贸易领域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还涉及投资、服务、金融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内容。灵活性是指对双方争议较大的领域(如农业、金融服务业)可以采取灵活的处理方法,甚至可以暂时搁置,不为个别领域的分歧影响整体合作。有选择性指在选择自贸区伙伴方面遵循经济利益、地理位置、政治与外交关系、可行性、时机等标准。

源是该国选择自贸区谈判伙伴的重要标准。

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为了促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韩国政府制定了“三步走”的自贸区战略。第一步是与美国签订自贸区协定，扩大韩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形成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盟。第二步是与欧盟和东盟签订自贸区协定。第三步是与中国进行自贸区谈判。韩国将对中国和日本的自贸区谈判放在美欧之后，其目的是通过学习美欧两个发达经济体的先进贸易制度提高韩国企业的生产效率，由此在与中国和日本的自贸区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①当与日本的自贸区谈判陷入僵局后，韩国积极开展中韩自贸区研究。相对于日本，中国更能使韩国长期保持高附加值和多样化的产品结构趋势，而中国丰富的资源及广阔的劳动力市场满足了韩国的发展需要。

由此可见，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上，中国与日本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冲突。作为以出口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发达国家，日本的自贸区战略是推行涵盖内容宽泛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而实现该地区规则和制度的协调和统一。一方面，在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领域的内容超过 WTO 的范围，即在传统型自贸区的基础上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竞争规则、标准认证、政府协调、人员流动、纠纷处理等广泛的自由化内容。另一方面，在农业等敏感领域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低于 WTO 规则的要求，即根据缔约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情况，选择对特定领域采取过渡性措施。^②显然，一个以经济治理为核心的大东亚区域框架，能使日本更好地发挥自己在规则与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和主导作用，而有针对性地采取过渡性措施又能给予缺乏竞争力的农业部门回旋余地。

中国推进自贸区的目的是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扩大市场规模并提升区域内贸易的水平。为此，其采取的方式是从早期收获条款开始，先签署货物贸易协议，然后逐步扩展到服务贸易协议的深度自贸区模式。究其原因，中国的农业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但工业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资金和技术产业、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动标准等方面难以协调。^③

如此看来，中日韩构建三国自贸区的主要症结在于中日之间的自贸区谈判。因此，率先启动中韩自贸区、以此推动中日韩自贸区显然是较为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目前，韩国已与美国、欧盟分别签署了双边自贸区协定，并已启动与中国的自贸区谈判。而日本与上述三大经济体均未启动自贸区谈判。尽管同样受国内农产品市场开放的限制，但相比日本，韩国在自贸区谈判中更能接受农产品部门的开放。韩美自贸区协定的签署就是很好的证明。随着日

^① 刘重力、盛玮：《中日韩 FTA 战略比较研究》，《东北亚论坛》2008 年第 1 期，第 56 页。

^② 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fta/strategy0210.html>；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http://www.meti.go.jp/english/policy/index_externaleconomicpolicy.html。

^③ 张彬、胡渊：《中日韩货物贸易自由化比较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第 82～83 页。

韩谈判的搁置、后危机时代中日韩自贸区战略的调整，中国与韩国首先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越发增大。2010年5月，中韩宣布结束中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为了协调敏感领域的意见，中韩两国政府又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磋商。^①2012年5月，中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开启。中韩自贸区谈判的成功将会推动难度更大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早日达成协定。而从深远的意义讲，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将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起到重要的牵引作用。^②

On Barriers and Path Selection of China-Japan-ROK FTA in the Post-Crisis Era

Fu Jingyun

Abstract: In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Japan and ROK held in May 2012, three countries agreed to launch China-Japan-ROK FTA negotiations by the end of 2012.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consensus will help to pull out of the lagging state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However, recently escalat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 Northeast Asia make the prospect of CJK FTA uncertain. Meanwhile, it has become a long-term trend that China, Japan and ROK will accelerate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its domestic economy and expand the scale of regional consumer market. It is a feasible way to firstly launch China-ROK FTA negoti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JK FTA.

Key Words: China-Japan-ROK FTA; geopolitical conflict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hina-ROK FTA

^① 参见韩国外交通商部网站。

^② 刘昌黎：《论中韩 FTA》，《世界经济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66 页。